

SHUOLI

说理

DE 的

艺术

YI SHU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说理的艺术

华 琪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说理的艺术

华 琪 著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 4.75印张 · 106,000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185·46 定价, 0.68元

序

《说理的艺术》，是《思想工作方法纵横谈》的续篇。不言而喻，取这个书名，意在探讨思想工作者的讲道理的艺术。

说理，也有什么艺术性可言么？艺术，常常被人们“视为‘蒙娜丽莎’的油画，‘天鹅湖’的群舞，‘维纳斯’的雕像，‘二泉映月’的琴声”。其实，为着开拓人的内在潜力，培育人类“最美的花朵”，塑造一代美的心灵，那情深意长的倾谈，那慷慨激昂的演讲，那所向披靡的雄辩，无不充满了精深的技巧，而堪称一门独特的艺术。

说理，之所以是一种艺术，是因为思想工作者无论是登台演讲，还是促膝谈心，都不应是一般的言谈。它不但要有一定的思想性，还需要有一种感染力和情趣，以调动听者的感情，陶冶听者的心灵；它需要饱含一种意蕴和哲理，以引起听者的思索，启迪听者的聪慧。

说理，之所以是一种艺术，是因为说理不仅需要依赖于抽象的逻辑思维来“证明真理”，而且离不开具体的形象思维去“显示真理”。如果说，以形象思维为主的艺术家用抽象思维提高了形象思维，给“龙”点了睛，给景着了灵；那么，以抽象思维为主的教育者，也应用形象思维来补足抽象思维，给理融进情，给人示以美。因此，相声的幽默，小说的形象，戏剧的冲突，诗朗诵的激情，都应当是说理艺术所博采的。那种照本宣科、毫无情感的演讲者，那种动辄伸手去

刮别人鼻尖的教育者，那种只会靠大话、空话去唬人的说理者，他们的说理，是断然不会有什么艺术性可言的。成功的说理，需要教育者调动全部才学和心智，凭借语言的魅力，遵循艺术的规律，融理智的真意、道德的熏陶和美的感染为一体，方能化真理为春雨，浇开璀璨的思想之花，育出累累的精神硕果。

说理，之所以是一种艺术，还因为思想工作者是塑造美的心灵的工程师和艺术家。思想工作者显然不是一般的工程师，同样也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家，他的教育对象是活生生的、时时都在变化的人。这就要求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说理，应赋有更高更强烈的艺术性。

世上任何事物的成功之路，都总有“捷径”可求。求捷径，乃是一种“优选法”、“运筹学”。良好的说理艺术，足以使思想教育之“舟”，顺风扬帆直抵理想的“彼岸”。可以这样说，不谙说理艺术的人，他的说理大都事倍功半。而具有娴熟说理艺术的人，当他登上思想教育的舞台，无论面对怎样的听者，阐述怎样的难题，他都能得心应手地导出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活剧来。

千姿百态的说理艺术之花，正期待着思想教育者去浇灌，去培育，去采撷。当然，这本冠以“艺术”的小册子，恐怕名难副实。但我不揣冒昧将它示人，旨在通过醒目的“艺术”二字，唤起更多的人来重视和探索这门艺术，使我们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更为人所爱，更富有征服人心的魅力。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李燕杰等同志的热情指导，在此特以致谢。

作 者

一九八四年春·北京

目 录

序.....	1
一、有情莫被多情误	
——情理交融.....	1
二、一枝一叶总关情	
——理利相济.....	5
三、岁岁年年人不同	
——辩证施教.....	10
四、柔似春水刚如火	
——柔中有刚.....	15
五、一滴水中见太阳	
——小中见大.....	21
六、不畏浮云遮望眼	
——切忌片面.....	26
七、莫把鱼目当珍珠	
——宣扬真理.....	32
八、一花引来百花开	
——榜样引路.....	37
九、好雨润物细无声	
——促膝谈心.....	41
十、含笑而谈又何妨	
——谈笑风生.....	46
十一、剪裁妙处非刀尺	

——直说不如巧说.....	51
十二、道理不尽在说中	
——说服加“看服”.....	56
十三、借得清泉润心田	
——“三性”统一.....	60
十四、踏破铁鞋觅事实	
——寓理于例.....	65
十五、千古当作纵横谈	
——巧于用典.....	71
十六、他山之石可攻玉	
——善用对比.....	76
十七、妙理并不在多言	
——说长道短.....	80
十八、托物喻理妙无穷	
——善譬巧喻.....	85
十九、以疑启思善设问	
——循循善问.....	90
二十、话须通俗方传远	
——追求朴素美.....	95
二十一、问君哪得雄辩才	
——逻辑的力量.....	99
二十二、精心设计一堂课	
——工于开端、巧于结尾.....	104
二十三、动作得体眼传神	
——声、色、姿、情.....	108
二十四、演讲得失不由天	
——锻炼口才.....	114

二十五、采花蜂苦蜜方甜	
——做语言的“富翁”	119
二十六、闯出新路有明珠	
——更新观念	124
二十七、高楼万丈平地起	
——思想工作者的基本功	129

一、有情莫被多情误

——情理交融

人生需要爱的温暖，就象沙漠之需绿洲、春草之盼甘霖一样。在人生的旅途上，那父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曾拨动过多少人的心弦，催开过多少理想的风帆。

心灵的呼唤，离不开感情作媒介；思想的共鸣，也需借助友爱去撞击。看电影《流浪者》，善良的姑娘丽达用纯真的爱情，把被饥饿、监狱、冷遇吞噬了灵魂的拉兹，召唤了回来，曾使多少观众为之“情动于中”。诚然，在那一切变成金钱关系的社会里，象丽达这样的姑娘毕竟只是少有的人物。但人情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感召力量，是为人们所公认的。情不通，理不达，感情相悖，即便金玉良言，也免不了会变成好雨浇在石头上。

讳言人情的价值和力量，难免滑入“左”的泥潭。十年内乱，“人情感化”横遭批判，曾几何时，冷漠取代同情，嫉恨取代友爱，仇视取代谅解，思想教育几乎成了“整人”的同义语，引起了人们对“以理教化”的“抗药性”。可是，倒脏水不能连小孩一同倒掉。空头政治，无情说教，绝不可有；政治倾向，思想深度，又绝不可不讲。“以情感化”与“以理教化”毕竟不是一回事。我们倡导“理在情中”，是说思想要象盐溶于水一样，溶化到感情中去；然而

溶化不是消失，不能推出“教化不如感化”的论断。“感化”失去了“教化”为引导，失去了正确思想作基石，这样的“教育”难免有“丧魂落魄”之误，“买椟还珠”之憾。

一位大作家说过：生活中往往充满着“但是”，事情本来应该这样发展，但是，结果成了另一种样子。有的思想工作者本希望所培育的先进之花蓬勃向上，出类拔萃，但是，由于一味“娇生惯养”，结果使他们骄横拔扈，始终只是平庸之辈；有的有心提携后进，但是，仅用“柔情”感化，尽灌些顺水推舟的“同情话”，结果使舒开的“心中疙瘩”又打上了“结”，卸下的“思想包袱”又背了起来；有的立意挽救失足，但是，由于只知道学医生给苦口良药包上糖衣，而忘了“救死扶伤”的宗旨，忘了对症下药的章法，结果不仅没有惊醒冥顽，反而使其在失足的迷途上愈滑愈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这种“人情感化”的教育，有人赠以对联一副：上联是“道是有情却无情”，下联是“说来甜心不醒心”，横批是“劝君三思”。

思想教育是一种感情的艺术，这话本没有错。只是思想教育者所讲的情，离不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之情，离不开对邪恶、对卑鄙、对腐朽的憎恨之情。思想教育者之爱，应比母爱更细腻，比父爱更广博，比情爱更质朴，比其它一切亲情之爱更纯洁、更高尚。那种丢掉原则、一味抚慰的温情，那种逢人三分笑、“美恶皆言好”的虚情，都不是思想教育者应有的感情。

近年来，有人曾十分推崇“爱情的力量”。人生是花，而爱便是花的蜜。爱情的美酒是醉人的，爱情的魅力也确实是神秘的。然而，对于挽救失足、塑造心灵来说，仅有爱情是远不够的。不少人读过报告文学《爱的暖流》，看过电视

剧《暖流》，这两个文艺作品都是以一个山东浪子与一位北京姑娘的爱情佳话为题材创作问世的。这个浪子到北京行骗，蒙蔽了一位纯真的姑娘。当姑娘知道真情后，并没有嫌弃他，竟与他成了家，她一心要用爱的暖流把浪子召唤回来，使他弃旧图新。人们称赞姑娘的行为，称赞她纯洁美好的心地，也庆幸浪子的良心发现，爱的暖流会使他不远而复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时隔不久，这个浪子旧病复发，舍妻女出走，又行骗了。他骗钱、骗物，还骗了一位陕西姑娘。终于又受到法律的制裁，“二进宫”蹲了班房。

当然，应该说，一位年轻姑娘慷慨地用自己的爱情去挽救失足，这种崇高的情操，真诚的友谊，十分难能可贵。但是，爱情毕竟代替不了教育。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爱情的意义就在于帮助对方提高，同时也提高自己。唯有那因为爱而变得思想明澈，品质高洁的人才算爱着。”同样，也只有那因为爱而变得“思想明澈”、精神焕发的人们，才算得真正的爱情，也才堪称是“以情感化”。回想当初，人们曾给那位浪子以何等诚挚博大的爱：姑娘节衣缩食，每月只吃几元钱的伙食，省钱帮他还账；有关单位为他找工作，给他送钱赠物；三十九家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的记者前往采访；来自各地的三千多封信件雪片般地飞去……何以这深厚真挚的爱护、关心未能暖温浪子迷惘麻木的心？难道爱错了吗？所有这些，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记取与深思呢？

要懂得人情的力量，也应知道情感的局限。思想工作的任务，是陶冶人们的性灵，打开人们的眼界，点燃人们的智慧，培育人们的身心，使之充实，使之文明，使之奋发，使之优美。要医治蒙上阴影的心灵，拯救被污染的灵魂，非真

理的春雨莫能洗涤，莫能滋润。倘若过分相信和依赖感情的力量，只是架通心灵之间的桥梁，不用精神的雨露去浇灌他们的心田，这种教育不仅不能根治那些“精神空虚症”、“道德贫乏症”，而且会造成新的失误。

一位教育工作者曾说过，成功的思想教育应“三分含情，七分叙理”。从广义上说，这话是颇有见地的。它辩证地告诉每个思想工作者，不要停留在“动之以情”，也不要局限于“晓之以理”，将情理有机地“化合”，做到情中有理，理中含情，情理交融，以理为主。这样，我们的思想教育就不仅使人如沐春风，如逢挚友，而且若饮甘霖，若遇良师，使人们的灵与感都得到升华，使思想教育更富有摄取人心的艺术魅力。

二、一枝一叶总关情

——理利相济

世上万事万物都有它存在的基础。作为开拓人的内在潜力，激发人的积极因素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不是空中楼阁，也有它自身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便是人民群众的利益。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给拉法格去过一封出人意料的书信。当时，年青的社会主义者拉法格正热烈地追求着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这位涉世未深的年青人怎么也想不到马克思会给他这样来信：“在最后肯定您同劳拉的关系以前，我必须完全弄清楚您的经济状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给自己未来女婿的信中，竟提出了一个经济问题，这也许会使许多人不解且惊讶。其实，这是生活的真谛。马克思从长期流离颠沛的贫困生活中知道，组织一个家庭，而没有一定的经济力量为基石，显然太幼稚了。人们尽可以赞美爱情的崇高和专一，然而却无法把需要、利益从爱情生活中绝对排除出去。“与君把手观青史，岂有不食烟火人？”俗语说：民以食为天。马克思的两大功绩之一，就是揭示出一个为重重烟雾掩盖的最简单的事实：人们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具有强大威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绝不是画饼充饥，沙上建塔。在苏维埃政权刚刚诞生的时候，一位工程师在一个报

告中写了这样的话：人们不可能长年累月地处于心醉神迷的狂热状态，不可能毫无收益地听信接受鼓动和宣传，只有经济上的必要才能推动他们的工作。对此，列宁曾作了一个精辟的评语：“正确！”

马克思有句名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可惜，十年内乱，谈“利”色变，物质利益同“钱能通神”绑在了一起，受到嘲弄，受到鞭挞，使思想政治工作几乎成了“假、大、空”的同意语，败坏了名声，“出尽了丑”。

诚然，古往今来，确有一些封建士大夫极少言“利”。孔子就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此“子罕言利”。孟轲对“利”一字避之唯恐不及，他在回答梁惠王有关“利”的话题时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董仲舒更有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训条。对这些警言训语，毛泽东同志曾一针见血地讥讽道：完全是“唯心的骗人的腐话”。

人要有一点精神。但决非要求人们去实行苦行僧主义和禁欲主义，象古代印度的苦行僧那样，排斥一切物质生活，故意不吃不喝，不穿衣衫，睡在砂砾和荆棘上，以求“解脱尘世的烦恼”。精神的追求与物质的需求总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年青人，对于物质的需求尤为强烈。青年从踏上青春门槛到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短短几年间，其经济负担从接近零点的地方直线上升到最高峰。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说，即达到对“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需要的最高峰。人们的思想症结大都是伴随着各种社会需求而萌发的。恋爱受挫，家境困苦，高考落第，疾病缠身，身处逆境，都可能成为一个人彷徨

徨、悲观、消沉的触发点。看不到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思想政治工作就难以给人所需，为人所喜。

人们常说：“我把党来比母亲。”其实，这种母爱春晖，常常是通过身为领导者的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来体现的。一个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在他们身上具有一种优秀品质——人民性。代表者，人民把重任交予你，希望你为人民谋利益；人民性，顾名思义，热爱人民之性。两者犹如两把尺子，鉴别着每个思想工作者是否时时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齐爱憎；处处体察民情，了解民意，赢得民心。就当代青年来说，爱情、成才、就业，已成为他们十分关切的三个“注目点”。然而，由于十年内乱欠债太多，青年人多种多样的实际困难，要解决好实在不易，有的也确实一时无法解决。但是，无能为力与尽力而为毕竟是两回事。暖人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应是想尽一切办法为鱼而水，为鸟而林，雨中送伞，雪中送炭，为青年自学成才开绿灯，为青年婚姻恋爱做“红娘”，为青年就业找门路，把党的母爱春晖送到每个青年心坎上。

有人曾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联之以利归纳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素。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抵都是以情为先导，以理促升华，以利作基石。列宁深谙这一艺术，他曾用情理交融、理利相济的思想教育，转化了许多顽固的敌对分子。反动的十月革命党人波里索夫的转变，就是生动一例。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铁路运输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经捷尔任斯基推荐，列宁决定会见交通专家波里索夫，亲自做这位反对党人的转化工作。列宁热情地让波里索夫在自己的藤椅上坐下，拉着手表示愿和波里索夫结为好友，并诚恳希望他识大局，辨潮流，真正和布尔什维克携起手来，为国

为国立新功。当时，波里索夫的妻子患斑疹 伤寒，危在旦夕。当他匆匆回到家时，医生正在抢救他的妻子，屋里已经过消毒，点着的炉火驱走了寒冷，面包、牛奶也送来了……当护士告诉说，这一切都是遵照列宁的指示办的时，波里索夫一颗激动的心终于燃烧起来了。妻子经抢救无效在四天之后去世了，他简单地把妻子安葬后，就挑起了苏维埃副交通人民委员的重任，为恢复铁路运输，振兴战后经济，作出了杰出贡献。

人，总是生活在矛盾之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欢乐，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忧愁。可惜，多年来，我们的思想工作者爱讲一句口头禅：“正确对待”。似乎这样才不迁就，不姑息，才显示出思想教育的原则性。诚然，凡事都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但切不能把这个词当成“万应灵药”。有的青年明明身处逆境，或身染病痾，或屡遭非议，或家遇灾祸。此时此刻，本需要领导者伸出热情相助的手，但一席生硬的“正确对待”的教育，非但不能触发被教育者的“觉悟”，反而使之愈加忧愁苦闷，愈加不能正确对待。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要人们一往无前，又不问人家后顾之忧。天下哪有这种便宜事！

当然，倡导联之以利，并非意味着用利去换取廉价的欢欣和贪心的满足。思想工作中的“利”，不应是诱人就范的“钓饵”，堵人之口的“糖果”。单一的离开“理”的“利”，不能把人们的思想引向崇高的境界，这一点是不能有半点含糊的。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望小 吾 曹 州 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清人郑板桥在山东当县官时，送给友人的一首小诗。意思讲他作为一个“父母官”；躺在

衙斋里也睡不稳，时时惦念着百姓，听见窗外风吹竹子的萧萧声，也好象听到民间疾苦的声音，虽然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芝麻官”，对于百姓的疾苦却是不无关情啊！诗是感情的凝聚，心声的流露。且不说诗人是否能够做到，单单这种挂念百姓疾苦的感情，就已为世人传颂。但愿我们的思想工作者从这首诗中获得启迪。教育同关心是不可分的，精神的追求与物质的需要也是密切相联的，一个教育者不能忘却被教育者的实际利益而狂热的鼓动，关情的“一枝一叶”或许会为你架起通向成功之路的桥梁。